

建国以来谭嗣同哲学思想研究概述

刘 伟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早年致力于中国古典书籍的学习,青年时期则游历南北各省,既广泛接触了现实的中国社会,又广泛接触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社会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学篇》、《思篇》、《思纬壹壹台短书一报贝元征》、《兴算学议》、《北游访学说》、《仁学》等,其中尤以《仁学》为重要,它集中反映了谭氏的自然观、认识论及社会历史观。

作为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和近代中国哲学界的著名学者,谭嗣同及其哲学思想受到后来者的极大重视。在日本,已有关于谭嗣同的哲学专著;在中国,解放前就有许多论及谭嗣同的文章和小册子。然而,真正对谭嗣同及其哲学思想加以认真研究,从而给予科学估价的,还是建国后三十余年的事情。

今拟将三十年来的谭嗣同哲学研究情况作一概述,供有关同志批评、参考。

一 三十年研究的历史轮廓

三十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所讲的那样,走了一条曲线,整个科学文化事业亦如此。作为科学文化事业一分子的谭嗣同哲学研究也走了一条曲线。这个“曲”不仅表现为研究的某些观点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还在于这种研究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几乎被窒息。将这条“曲线”做一划分,可以得到四个相互联接又相互区别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建国初期到一九五七年底,这是一个初步探索的时期。在此时期中,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开始全面地引入中国的学术领域,它反映在谭氏哲学研究中就是许多哲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按唯物论与唯心论是两大基本哲学派别等观点对谭氏哲学做了剖析,从而在对谭氏观点的分析方面有了一定的深度。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同一般历史的研究工作配合得十分密切。一九五四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蔡尚思先生主编的谭嗣同去世以来的第一部《谭嗣同全集》;一九五五年上海出版公司又出版了文操编的小册子《谭嗣同真迹》;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廷福先生的《谭嗣同年谱》,这期间还有若干篇考证文章。这种历史的研究工作,为哲学工作者认真探讨谭氏哲学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时期较引人注目的有杨正典、李泽厚、孙长江几位同志的若干篇文章(按发表文章的先后顺序)。

这时期的研究工作也有几点不足:其一,对谭氏思想分析较为笼统,突出表现就是对谭氏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研究不够,很少有人专文论及谭嗣同思想分期问题。其二,较重谭氏的政治思想,相对地看轻其哲学中的思辨成份;这时期以发表在《文史哲》五四年第九期

上的郑鹤声同志的《谭嗣同的变法思想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为第一篇重要文章，以陈旭麓同志的《论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与改良主义政治实践的矛盾》一文为最后一篇重要文章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其三，有将哲学思想的进步性与唯物性及其对现实有促进作用诸问题等同的趋势，例如有人挟谭氏思想对现实起了极大推动作用而发问道：难道有这样进步意义的思想还不是唯物主义的吗？

第二个时期是从五九年到六五年。这时期较重要文章有十余篇，其中以冯友兰、张德钧、严北溟几位同志的文章影响为大。这时期的研究有几个引人注意的现象：一、更加重视哲学的党性原则问题，重视谭氏哲学上派别从属问题。二、对谭氏哲学的研究已深入到其内部结构问题，这种深入在横向上表现为较重谭氏哲学几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严北溟同志的文章就专辟了一节讲谭氏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社会政治思想，统一了这种深入在纵向上表现为重视谭氏哲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如张德钧同志一反多年来从总体评价谭氏哲学的风格而按谭氏思想发展的时间顺序评述了谭氏哲学，将其第一次明确地分为五个阶段。其三、更为详细地讨论了谭氏哲学各范畴之间的关系，诸如“以太”与“仁”的关系、“以太”与“心力”的关系、“仁”与“通”的关系等。其四、前一阶段对谭氏哲学路线从属问题以唯物说为主，这时则以唯心说占据了主要地位。

第三个阶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如同整个科学文化事业遭到空前的浩劫一样，谭氏哲学研究工作也嘎然中止，十年之中没有一篇专论谭氏哲学的文章问世，偶有提到谭氏哲学思想的文章，也是简单的结论堆砌代替了对事物的认真分析，肤浅的说教代替了对事物的认真研究。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给后来的研究以智慧的启示，那么这个阶段给后来的研究留下的只是朦胧的回忆。

第四个阶段是粉碎“四人帮”迄今。“四人帮”的被粉碎，引来了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春天，谭氏哲学的研究也枯木逢春。一九八一年初中华书局出版了蔡尚思、方行二位先生重新校订的《谭嗣同全集》，加入了近四分之一的内容，另外也有若干篇关于谭嗣同的历史论文。与这种历史研究的复苏并行的是对谭氏哲学研究的复苏、发展。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四册等都较为详细地评述了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更引人注意的是徐义君同志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在旧有的研究成果之上写成了《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这时期，对谭氏哲学的研究无论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前几个阶段，主要表现为：一、更深刻探究了谭氏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二、更为全面、详细地研究了谭氏哲学诸范畴之间的关系；三、基本上排除了以前研究中存在的简单以其政治思想为依据来评价其哲学思想的倾向；四、注意力较多地从社会历史观转向自然观和认识论，如一九八〇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第一期登载了三十年来的第一篇专论谭氏认识论的文章。

总之，建国以来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研究走了一条曲线。但这条线路虽弯曲，却指向科学的目标。较为科学、繁荣的今天，预示了更为科学、繁荣的明天。

二 关于谭嗣同哲学的思想渊源和发展阶段问题

谭嗣同称自己的学说为“仁学”。对于“仁学”的渊源，他写道：“凡为仁学者，于佛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仁学》）这里实际包括了古今中外众多的学术流派，在这其中有许多学术派别是尖锐冲突的，如王船山与王阳明的学说，《庄子》与《孟子》等。谭嗣

同为读者所列书目的庞杂，引起了后来者对其思想渊源的争论。

由于谭氏已为读者列了一个详细书目，所以争论的焦点并不是来源于什么，而是在这些来源中何为主要成份。对这种主要成份的分析有两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上，研究者意见较为统一，认为主要是五种成份：儒家早期经典著作；明末清初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佛学、基督教神学思想。

第二个层次是在第一个层次的五种成份中挑出更为主要的成份，即决定了谭氏哲学基本倾向的部分。对此研究者意见颇为分歧，有几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西方的先进自然科学知识及明末清初的民主主义思想是谭氏思想来源中的最主要成份。在这些同志看来，明末清初的民主主义思想决定了谭氏社会思想是进步的，中国旧有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则决定了谭嗣同的自然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唯物的。在这其中，有一些人认为，由于引进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使谭氏哲学大大超过了以“元气一元论”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古典唯物主义。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五种成份在谭氏思想中犬牙交错，各占一定地位，除了明末清初的民主主义思想对谭氏社会政治思想、历史观有决定影响之外，很难说清楚其它几种成份哪部分更重要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为数较少，主要在第一、二两个时期。第三种观点认为，明末清初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佛教哲学思想是谭氏思想来源中居统治地位的因素，前者使他的哲学思想呈现出民主主义色彩，后者则使他的哲学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在这些同志看来，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在谭氏哲学中仅是从属于佛学的东西。他们大多引用了谭氏《仁学》中的一段话为论据，“西学皆源于佛学，亦唯西学而佛学可复明于世。”第四种观点认为，谭氏哲学有不同阶段，各阶段的主要思想渊源不统一。例如有人认为，在一八九六年之前，对谭氏哲学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特别是张载、王夫之的“气一元论”和“器体道用”思想，一八九六年之后则主要是佛教思想。

上面的介绍已经反映出讨论谭氏哲学的思想渊源问题就必然要涉及到其哲学思想的分期问题。对于分期问题，至今也有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绝大部分人的观点，认为谭氏哲学分为两个时期，即以一八九四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为界线。持这种观点同志的论据一方面来自对谭氏在此前后哲学思想的分析，一方面来自谭氏自己的一段总结：“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第二种观点是三阶段论。最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是徐义君同志的《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他以甲午战争和谭氏一八九六年一月的北游访学为两个分界点将谭氏思想一分为三。第三种观点是张德钧同志在六二年第三期的《历史研究》上提出的。他以谭氏的年岁为界线点，以谭氏若干篇文章为各阶段思想的反映：二十六岁以前是一个阶段，思想以《治言》篇为主；二十六岁至三十岁为一个阶段，思想以《学篇》和《思篇》为代表；三十一岁为一个阶段，思想以《兴算学议》和《短书》为代表；三十二岁为一个阶段，思想以《北游访学记》为主；最后一个阶段是三十三岁的时期，思想以《仁学》一书为代表。同前，第二种观点已有人表示赞同，第三种观点尚无人附和。

三 关于谭嗣同哲学的派别从属问题

这是多年来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因此也是分歧意见最多的问题。将这些分歧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有六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谭氏哲学是唯物论体系，它表现在自然观上，以“泛神论”反对了“有神论”，以物质性的“以太”作为世界本源从而反对了唯心主义；在认识论方面，以唯物论的反映

论反对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在伦理思想方面，以唯物主义的“感觉论”批判了“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在历史观方面，他强调民主、科学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坚持了唯物主义。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中，甚至有人将谭嗣同称为中国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者”。

第二种观点认为，谭氏哲学是唯心主义体系。因为：在自然观方面，他以神秘的精神本体“以太”统治了宇宙空间；在认识论方面，他强调知先行后，还将认识来源归于大脑本身并通过大脑活动置于神秘的以太的统治而归于“以太”；在历史观方面，他强调英雄是历史的主宰，强调“心”创造世界的无限能力，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

上述两种观点是截然对立的，这种对立的焦点问题是对“以太”概念的理解。在“唯物说”看来，“以太”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物质概念，因为谭氏明确讲道：“任剖某质点一小分以至于无，察其为何物所凝结，曰惟‘以太’……至于一滴水，其中莫不有微生物千万未已，更小之又小至于无，其中莫不有微生物，论寄至空气之中，曰惟‘以太’。”“然原质有七十三异，至于原质之原，则一以太而已矣。”唯物说有一个基本的推理：由于“以太”概念是物质性概念，“以太”是谭氏哲学的基本范畴，因此谭氏哲学是唯物论的体系。“唯心说”则力图证明“以太”是一个精神性概念。在他们看来，唯物说所引证的话只说明了“以太”的根本性而未说明其物质性，由于谭氏将“以太”视为无声、无形的东西，因此“以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是一个精神性概念。

第三种观点认为，谭氏哲学属于二元论的体系，其中唯物论与唯心论成份互相匹敌，并且“以太”概念是一个混杂了唯物论与唯心论成份的概念。当谭氏用“以太”的普遍性、客观性来解释自然时，他是一个唯物论者；当他用“以太”有知说来解释意识现象时，他是一个庸俗的物活论者，他通过灵魂不灭说等走向了唯心主义营垒；当他用“以太说”“心力无限论”来解释社会发展问题时，他是一个历史唯心论者。

第四种观点认为，谭氏哲学总体上是唯物论，但有较浓厚的唯心论色彩。他们明确提出：“谭嗣同哲学总体上是唯物的，但有唯心成份。”（冯友兰先生）支撑这一论点的主要论据就是经过一系列分析之后建立起的“以太”虽有精神因素，但总体属于物质性概念的观点。

第五种观点恰与第四种观点相对立，认为：谭氏哲学总体上是唯心主义，但也有较浓厚的唯物论色彩。这种观点以张立文等同志为主要代表。他们对问题的分析也主要是从对“以太”概念的分析入手，并从这里推及到整个谭氏哲学的体系。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第二种观点中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谭氏哲学中有某些唯物论因素。第二种观点与第五种观点在这方面的差别仅在于对谭氏哲学中唯物论因素强调的程度不同。

第六种观点：避开对谭氏哲学思想的总体评价，而分阶段来评述其哲学路线的从属。这种倾向从争议一开始就有所表现，如李泽厚同志五十年代写的文章中就有这种思想，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九七九年出版）中更为明确地指出，一八九五年的《思纬壹壹台短书——报贝元征》一文将谭氏哲学分为了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朴素唯物主义，后期则逐渐转向唯心论。

四 关于谭嗣同哲学的阶级性和历史地位

对谭氏哲学阶级性的分析是从对谭氏本人阶级地位的分析开始的，对此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其一，谭嗣同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谭嗣同与康有为、梁启超这些著名的改良派人士观点虽有差别，但这种差别甚微，不足以构成左翼和右翼这种质的差别。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为数较多，主要在第一个时期。其二，谭嗣同是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中的左翼分子(李泽厚)或称激进分子(严北溟)。在这些同志看来,改良派内部的差别并不是细微差别,这种差别足以使研究者和分析时据此将改良派再行划分,结果是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为左翼,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右翼。其三,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言人。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张德钧同志。在他看来,前两种观点“恐怕都值得商榷”。因为“改良派与革命派区别的唯一关键是反满与否,主张推翻君主专制与否,是夺取政权主张用暴力与否”。他经过一系列分析导出了谭嗣同是主张反满、推翻君主专制、暴力革命的结论,并进而导出了谭氏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结论。

与上述对谭氏阶级地位分析的三种答案相适应的是对谭氏哲学阶级性分析的三个结论。例如,李泽厚同志从“谭氏是中国近代改良派中的左翼分子”出发指出:谭氏思想是左翼分子思想的集大成,它“客观地独特地反映了这种下层左翼知识分子的较激进的情绪和要求,反映了他们将由改良主义自由派向民主主义革命派转化的内在阶级内容和历史倾向”。值得提出的是,三种观点虽然不相同,但在分析谭氏哲学的社会作用方面,却一致认为它对社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谭氏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谭氏将“以太”这个范畴从西方自然科学中引入中国哲学史,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充实;至于这个充实的结果是否发展了中国哲学史,是否使谭氏享有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拓者这样的声誉,却众说纷纭,主要有如下两种观点:第一,谭氏哲学并没有开创中国哲学史上的新局面,他的思想不过是东西方多种思想的大杂烩而已,是不成系统的东西;他虽引入了西方文化但并未消化。一些认为谭氏哲学是唯物主义或基本是唯物主义的同志也持有这种观点。第二,他适应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综合了旧有的哲学思想和新的文化要素而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即机械唯物主义阶段。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冯友兰、杨正典等人。在他们看来,谭氏发展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表现就在于他用“‘以太’是万物本源”的思想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用“‘以太’与仁的关系”的思想发展了王夫之的“器体道用说”。

* * *

上面概要介绍了建国以来谭嗣同哲学研究的状况。如前所讲,这种状况展现了过去也预示了未来;只要我们遵循着正确的路线前行,未来的谭嗣同哲学研究一定会在已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更加科学、繁荣。